

季富政 著

采风乡土

——巴蜀城镇与民居

CAIFENG XIANGTU
BASHU CHENGZHEN YU MINJU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采风乡土

——巴蜀城镇与民居

季富政 著

巴蜀城镇类型	12
(一) 地理环境与城镇	12
中心城镇	12
一方水土——雅安上里	14
一方风土	19
情土方寸	24
农业中心	29
沿江城镇	30
云梯千步	30
陡街五里	35
尺壁百寻	41
(二) 巴蜀城镇空间特色	44
沿江城镇	49
山村民居	50
特色民居	50
特色民居	52
特色民居	59
特色民居	66
特色民居	70
特色民居	71
特色民居	73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成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 / 季富政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643-4164-0

I. ①采… II. ①季… III. ①城镇—城市规划—研究—四川省②城镇—民居—研究—四川省 IV.
①TU984.271②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88384号

采风乡土——巴蜀城镇与民居

季富政 著

*

责任编辑 廖艳珏

封面设计 原谋书装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146号 邮政编码：610031 发行部电话：028-87600564)

<http://www.xnjdcbs.com>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成品尺寸：200 mm × 276 mm 印张：15.875

字数：319千

2015年8月第1版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43-4164-0

定价：8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目 录

一、巴蜀城镇概况	1
(一) 巴蜀城镇溯源	1
(二) 巴蜀城镇空间特色	7
二、巴蜀城镇类型	12
(一) 地理环境与城镇	12
中心场镇	12
一方水土——雅安上里	14
一方风气——酉阳龙潭	19
惜土方寸——合江福宝	24
农业中心场镇空间概说	29
沿江场镇	30
云梯千步——石柱西沱	30
峡街五里——酉阳龚滩	35
岸畔百家——双流黄龙溪	41
似场非镇——北碚金刚碑	45
沿江场镇空间情理	49
形胜城镇	50
错位之“圆”——巫山大昌	50
得意山水——阆中	62
金汤之固——广元昭化	66
巴蜀“形胜”城镇一斑	70
风景场镇	71
桃源秘境——江北偏岩	73

峨眉山后——洪雅柳江	78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83
山寨场镇	85
围合兴场——合川涑滩	86
场为寨生——隆昌云顶	90
场镇的围合形态	94
山顶场镇	95
脊上兴市——通江麻石	96
(二) 独具空间特色场镇	100
廊坊式场镇	100
以廊为街——涪陵大顺	101
上廊下街——大竹清河	102
“云中一把梭”——犍为罗城	104
“江边一只船”——广安肖溪	108
廊坊式场镇优越性与空间美感	111
(三) 殷实的盐业场镇	112
华屋连谷——巫溪宁厂	113
山墙如云——资中罗泉	118
多姿多态建筑景观	123
(四) 寺观与场镇	124
“寨”兴镇护——忠县石宝	125
(五) 最初的场镇胚胎	129
聚落初始——自贡彙柴口	130
么店几家——綦江东溪河系列么店	133
么店小考	137
三、巴蜀民居概况	139
(一) 自然概况	139
(二) 礼俗风情	140
(三) 历代民居综述	141
干栏式	141

官室式	144
碉楼式	146
乡土小舍	149
四、巴蜀民居分布	151
(一) 秦陇巴蜀之间	151
(二) 巴蜀客家民居分布	152
(三) 四川客家民居演变与发展	155
(四) 局部地区流行的民居样式	161
(五) 城镇民居	163
五、巴蜀民居例析	166
(一) 宅第·庭院	166
宅第生辉——温江陈宅(陈家桅杆)	166
(附: 谷川文: “争奇斗异的百年古宅”)	171
雅俗一宅——酉阳吴宅	173
杂院深深——洪雅王宅	177
幽兰芳墅——峨眉山徐宅	180
(二) 碉楼民居	182
大岭山庄——江津王宅(会龙庄)	182
秘境诡制——武隆刘宅	186
印台堡垒——达县柏宅	190
廊连碉舍——涪陵刘宅	192
泥亭热土——合江李宅	195
地坝水池——璧山张宅	197
武为文用——宜宾邓宅	200
城廓围合——屏山龙宅	203
(三) 土楼民居	207
川中孤楼——涪陵瞿宅	207
山顶望月——涪陵周宅	211
(四) 乡间小舍	214

一、巴蜀城镇概况

(一) 巴蜀城镇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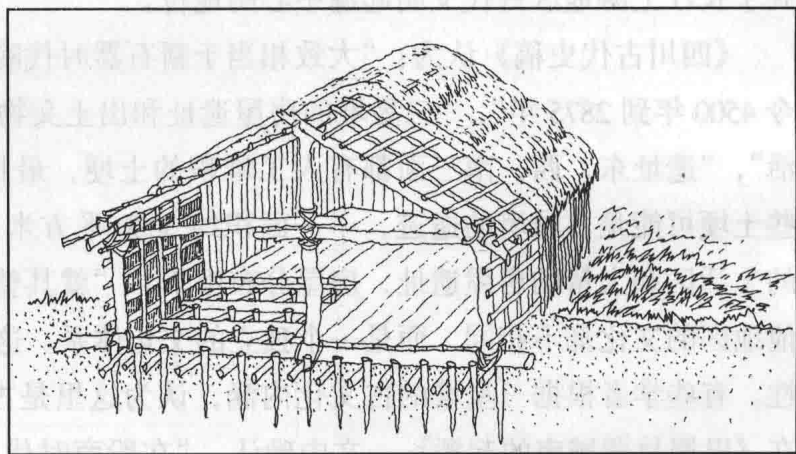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成都平原相继发掘出一批史前城址。它们有新津县宝墩古城址、都江堰芒城、温江鱼凫城和郫县古城。这些古城址，考古学家们认为：多数是早于广汉三星堆古城的史前城址，是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古城址的发现。这就把成都地区推到了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起源中心的地位。

《四川古代史稿》认为：“大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西周初年，其绝对年代大约距今 4500 年到 2875 年”，“三星堆的房屋遗址和出土文物反映出当时居民已过着密集定居生活”，“遗址东，西，南三面都有人工堆积的土埂，最长者约有 1000 米，……有人认为这些土埂可能是古城墙的遗迹，……面积约 3000 平方米，在这个‘城墙’内发现了古居民的生活区和大量的房屋遗址，房屋分布密集。”“就其整体特征来看，它与中原文化以及其他地区的文化都不相同，而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这强烈反映出三星堆文化鲜明的地方性。有些学者根据三星堆的古文化内涵，认为这里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与此同时，段渝在《巴蜀早期城市的起源》一文中确认：“在殷商时代，以成都平原为本土的蜀王国已经产生形成了两座早期城市，即广汉三星堆蜀都和早期成都。”林向在《论古蜀文化区——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一文中进一步论证：成都平原在“这样优良的环境下，食品丰富使人口增长和集中，形成聚落，并向城市演化，城市化是文明进程的主要内容，城市成为一个经济文化区域的核心，并与邻近的一系列大小聚落形成网络。成都平原上古蜀文明的遗存星罗棋布，而在广汉与成都两地形成两个巨大的商代城邑（后者可能稍晚），形成双子座式的城市布局。……应当是古蜀文化区内的中心城市。”

综上，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古代蜀国围绕三星堆和成都两座城邑而星罗棋布大小聚落的宏巨空间分布形态。虽然，至今尚还不可详知“大小聚落”“大”到什么程度，“小”到什么范围，其各自人口构成、功能、居住形态等进一步的信息。然而，大小聚落形成的空间网络则说明了两座古都城的形成不是孤立的现象，它依赖的正是星罗棋布的大小聚落作为空间发展的基础。若按城市发展的规律推测，这些大小聚落中，定有不少向着介于都城与聚落之间的空间格局与内涵方向演变。因为“蜀地在西周初期的变换关系也已经相当

发达了。”

若把这种空间分布扩大到鄂西与川东地区,《四川古代史稿》继说:“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鸟首形器柄’……这种器物在鄂西地区也有发现。……属于成都平原的考古学文化范畴,……相隔数千里之远的两地都有遗存,绝非偶然。”而“鸟首”者,即为鱼鳧之头。“灌县之东有鱼鳧之国”,“温江有鱼鳧故城”,“湖北沔阳有鱼腹故城”,“巴郡有鱼腹县”,“南溪有鱼符津”,“乌江为巴涪水”,“合江境内汉代有巴符关”,“鱼腹,巴涪,巴符,鱼符,鱼涪都是鱼鳧的异写。……鄂西,川东当是鱼鳧先民活动的中心地带,把上述地名分别作为点,再将点联成线,就可以发现从江汉平原到成都平原之间有一条以水路为主的通道,鱼鳧先民迁徙的轨迹也依稀可辨了。”从以上的论述中又使我们进而看到,不仅成都平原,在整个四川盆地的东部、南部及西部,以水路为主轴的人口聚落框架实质上已经构成,随之而起的居住形态亦定然遍布这些地区。这从上述地区发掘出的房屋遗存亦证实了这一点。这种人口聚落的空间理应是后来集市、市街、场镇直至城市形成的基础。因为在聚落内部必然组织生产,相互交往,以至聚落之间的运输、物品交换等。实质上,西周时期,中原地区为适应宗法分封的政治需要,已经产生了我国第一个城镇规划制度的“营国制度”。虽然它是以“城”作为政治中心,以“廓”作为经济中心,但随着相互功能不断变大、相互空间的不断变化,尤以经济职能的进一步扩大,使得城廓合一,各职能空间统而有分,这就往城市化的方向大大向前迈了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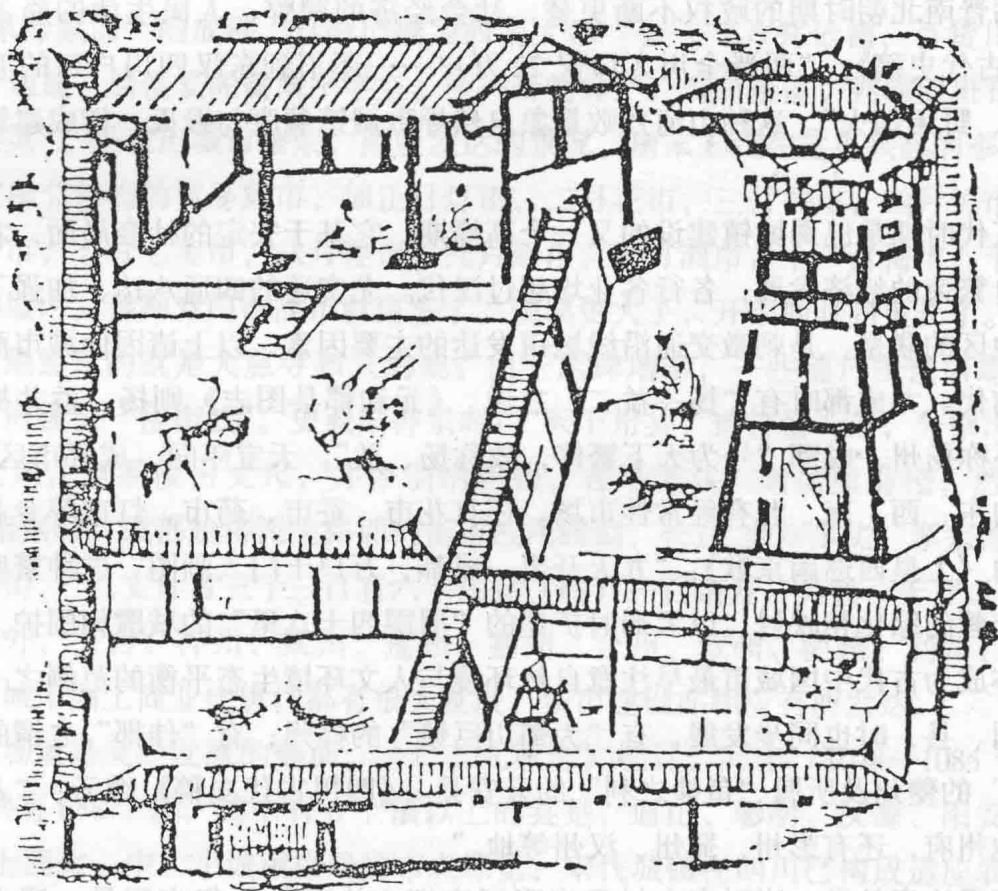
(图1) 成都十二桥出土商代干栏复原图

而公元前七世纪时的开明王朝时,开明王已开始“立宗庙”。这种建设,《四川古代史稿》认为:“标志着更进一步吸收中原文化,国家机器逐步健全,礼乐制度日趋完备。因而原来的都城已不能适应新的发展需要,于是把都城自广都樊乡迁到成都,除旧布新,另创规模。”这里的“新”,“规模”,有两层意义:一是蜀中城镇进一步受到中原文化影响,二是城镇的功能向着完备方向发展。两层合一,即在城镇空间形态上产生了西周前的古蜀土著形态和中原空间形态的结合。所以,《四川古代史稿》又说:“一些古建筑专家认为,这些房屋(指成都十二桥遗址)是典型的干栏式建筑,其格局既属地道的商周时代住房,又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形”(图1)。

到了秦代,这种影响已具有某种决定性意义,《华阳国志·蜀志》说到当时的成都规划

格局时，其规模：“与咸阳同制”。空间特色是：“造作下仓，上皆有屋，而置观楼、射兰。”“城周回十二里，高七丈。”不仅如此，巴蜀一大批城镇亦同时产生，郫城、临邛城、重庆、涪陵、阆中、合川、丰都等，共达 19~41 个之多。这些城镇“都是非华夏民族较为集中之地”，又在秦的统治之下，“修整了居民住宅和市场”。所以，秦举蜀的结果，“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推进了巴蜀地区的经济，同时又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从而逐步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以及一些固有的习俗，从战国后期开始，中原文化不断向‘巴蜀文化’渗透，而巴蜀文化的自身特点也在逐渐减弱。随着时代的推移，中原文化最终将取代巴蜀文化”（《四川古代史稿》）。建筑作为文化载体，同时又反映出固有的习俗。于此间受到中原文化决定性的影响。巴蜀之地从城镇到聚落进而单体建筑，无不处处浸饱了中原文化色彩。

从资料上看汉代是巴蜀建筑一个非常辉煌时期，尤张仪经营西蜀，把城廓的中原制度带来亦必然以中原的宫室制度同时带来。刘致平先生在《中国建筑简史》上说：“四川在早是用干栏的，但是什么时候才大量用普通常见的宫室式建筑，……至迟是秦伐蜀以后的事情。”尤其东汉画像砖在各地的发现，中有不少题材表现了汉代建筑的面貌是国内少见的。双流牧马山画像砖中大型宫室式庭院（图 2），成都西门外曾家包画像石描绘的地主



（图 2）双流牧马山出土东汉画像砖之庭院图

庄园等等，均堪称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葩。加之刻制仿木楼观式结构的石阙在川中居全国之冠的数量和特色，文翁学堂以石建书库的建筑构思，以及汉赋中对于“苑囿之盛，宫室之美”的描写，使人不难想象，在汉代发达的农业、手工业基础上产生的城市，像成都这样当时称为“五都”之一的大城市，绝不仅仅是“大”而已。城市建筑内涵必然是除“城廓”之外更有丰富而卓越的包括宫室式住宅、店铺、作坊等系列空间构成。既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必然有相应的空间形式以荫庇。今虽不可详知具体形貌，但从有限图文资料中全可归纳构成美妙想象，其市井空间之盛，亦不在宋时东京汴梁《清明上河图》繁华之下。扩而大之四川若干郡县所治之地，亦是相当的繁荣，时西汉就达5郡59县。若从《华阳国志》中所载汉代产盐的忠县、云阳西（云安）、巫溪大宁镇、三台棲江场、阆中、泸州、内江、高县、邛崃、什邡等地看，以今这些地方多有精美城镇窥渊远建筑古风，以清以来川南自贡为中心的华丽城镇建筑为比较，亦可见汉代盐业城镇该是何等宏丽壮观。如果说建筑作为文化载体，综合反映了一方的经济、政治、民俗之况，亦同时反映了建筑风格、形制、作法诸况。那么，像双流牧马山式庭院格局亦不是孤立的建筑现象，它必然有相同或类似之作广布蜀中或影响其他地方。亦必然影响城镇中的市井建筑。若果真如此，汉代蜀中城镇该是历史上城镇建设及建筑风貌最辉煌的高峰期之一。亦是灿烂的城镇空间景观。

蜀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不断更替，社会经济的凋弊，人民生活的痛苦及战乱频仍。《四川古代史稿》：“西晋全川人口仅22万户……还不到东汉四川户口的五分之一”，“城邑皆空、野无烟火”。这种山河残败景象自然导致城镇颓废与毁灭，衍成建筑发展的低潮。

隋唐五代时期是巴蜀城镇建设的又一个高峰期。它基于安定的社会局面，农业、手工业复苏渐自繁荣的经济发展，各行各业均超过汉代。尤交通的四通八达，加强了和外省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是刺激交通沿线城镇发达的主要因素。以上诸因使城市商业的繁荣也超过了前代。尤成都时有“扬一益二”之说。《元和郡县图志》则扬、益并提，其“逸文”卷2还称扬州，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天宝年间，成都市区约有10万人口，城内东、西、南、北有经常性市场。还有花市、蚕市、药市、灯市等专业与季节性市场。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这种繁盛景象，和城上遍种芙蓉的绿化相映衬，以孟蜀时扩建的“周围四十八里”的城廓相围护，不仅得蓉城美名，亦成为古代中国城市最早注意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生态平衡的范例之一。

巴蜀州、县，时也同步发展，有“为蜀川巨镇”的梓州；有“佳郡”之谓的嘉州，有“峡中大郡”的夔州及所属“鱼盐之利”的云安县。《四川古代史稿》继云：“人口在3万以上的其他州府，还有彭州、蜀州、汉州等地。”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在农村已出现了定期交换商品的集市贸易，谓之“草市”，有成都东门外草市、灌县青城山草市、雅州蒙顶山麓草市、遂州斯安草市等。这是四川场

镇形成的最初形式之一。

草市，其各因市简略，粗糙或贸易时间暂短者不可考。《辞海》谓：“中国旧时乡村定期市集的通称。各地又有俗称：两广、福建等地称墟，川黔等地称场，江西等地称圩，北方称集，起源很早。东晋时建康（今南京）城外就有草市。大都位于水陆交通要道或津渡及驿站所在地，命名用意，或说因市场房舍用草盖成，或说因初系买卖草料市集。其发生存废，既非官设，也无市官。有的草市后来变成新的城镇。”《辞海》市与场的详释似乎有些笼统，但确又不好界定。至少在次序上应先有市后有场，进而形成镇的历程。此间很大程度以是否有建筑出现为转折。比如：市不一定有住房和烟、茶、酒、饭诸空间以买卖，而场却有了应运而生的房屋棚架。此在川中至少如此。当然，无论怎样，隋唐时期出现了县以下市集为后来的场镇发展奠定了基础，也是后来部分场镇形成之因。

另外，如果把建筑视为艺术，视为和其他艺术形式同步发展的门类，那么，唐代杰出的石窟寺摩岩造像，前蜀王王建陵墓建筑高超的科技水平，诗歌、绘画、戏剧、文学的人才辈出和高度成就，都同时说明了，隋唐之际的巴蜀建筑及城镇建设的璀璨，定然有非凡的表现其艺术和科技成就，亦定然不在其他门类之下。此应是文化整体向前发展的规律。同是文化诸科相辅相成的结果。

宋代巴蜀之地城市繁荣景况，《四川古代史稿》有引述各文献的综合精彩描写，现摘录如下：“素号繁丽”的成都，这时已成为西南大都“会”，“万井云错，百货川委，高车大马决骤于通途，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奇物异产，瑰琦错落、列肆而班布。黄尘涨天、东西冥冥”。呈现出城市繁荣，商业发达的景况。唐末五代在这里兴起的季节性贸易，已发展为按季节售物的贸易集市，如正月灯市，二月花市，三月蚕市，四月锦市，五月扇市，六月香市，七月七宝市，八月桂市，九月药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在成都城内，各种专门商品市就更多了，规模更大了，开市的时间更长了。且大都有固定地点，最经常的就是大慈寺和玉局观。由于店肆增多，一些铺户所设店肆向街心发展，因此官府强征“侵街钱”。史载宋神宗时：“天下卅县，遂打量街道，分擘沟渠，虽是已出租税之地，但系侵占丈尺，并令别纳租钱，若不承认，则彻屋剪檐，然后获免。”“……高宗绍兴时，成都始将泥土路面的街道改用砖砌，长达 2000 多丈。孝宗淳熙时，范成大再次砌街，‘以丈计者三千三百有六十用甃（砖）一百余万，为钱一千万。’”

除成都外，三台、梓州、梁州、遂州、嘉州、合州、叙州、泸州、利州、渝州、夔州、绵州等城市因工商业比唐代都有很大发展，城市建设亦相应有所发达。

集市，场镇是又一发展的侧面，《元丰九域志》统计，元丰（1078—1085 年）初年：“川峡四路共有 688 个镇，其中有 6 个镇以上的县是：眉山、彰明、汉源、阳安……等共 43 县。”从上面大、中、小城镇格局的布点综览：宋代城镇在四川已构成适应农业、手工业、商业平衡发展的网络。实则已初具了现代四川城镇构架的粗线条，其后明清的城镇扩大，正是在此基础上生发的。

元代四川农业凋残，手工业、商业远不及宋代昌炽。县城在宋代 180 个的基础上跌到元代只有 96 个。仅存者亦可见颓败苍凉之貌。

明代是一个好景不长时期，仅初几十年昌明，接着战乱不止。四川经济虽无大起大落，但在城镇建设方面远逊色于宋代。其县城虽复苏到 111 个，但比起宋代：“万井云错……层楼复阁荡摩乎半空”的城市景观，那就不可同日而语了。但有一点值得注意：即“客户超过土著”，明初四川的移民大量来自湖广地区的人口构成特点。这些移民必然把包括建筑的习俗带来四川，同时又影响着城镇的建筑空间构成和特色，此无形中成为改造宋以前纯正绮丽城镇空间的开始，使四川建筑逐渐染上移民色彩的发端，这里主要指的是湖广地区的建筑影响。但究竟具体影响到什么程度，上述仅为推测。不过，明代典籍、诗文对城镇繁荣、建筑宏丽的载述与描绘和唐宋时比较，则大相径庭了。不仅少见，反倒以苍凉者见多。万历年间南充诗人黄辉《白沙驿》：“山驿冷荒荒，昏烟带叶黄，窗交蛛网日，垣隙虎蹄霜。”这是四川之外包括发达的江南地区不可能见到的情景。

尤明末清初的战乱，自然灾害的深重，更把人口锐减到不足 9 万人的极限。建筑为人造，“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加之木构建筑易罹火楚、潮湿朽败。天灾人祸，亦同时把明以来渐自衰败的城镇和建筑几乎毁灭。这是其他省区少见的建筑情况。关于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川中史志载述多多，如《蜀乱》言：“连城带邑屠尽杀绝，并无人种。”《四川清代史》：“数千里内，城廓无烟，竟成邱墟。”“荆棘之所丛，狐狸豺虎之所游。”时四川盆地内实成蛮荒之地，城镇、民居已成空白。现再摘一二：

《小方壶斋与地丛抄王云蜀游记》云：

“蔡公毓荣……辛亥正月余自荆南偕之人蜀成都自献贼之乱，官民庐舍劫火一空。蔡公至，馆于棘园，即蜀王故城也，規制略如大内而差愜，惟存重城，馆舍皆草创……城中茅舍寥寥，……至眉州，州治荒芜，三苏祠尚存木假山堂……明日次嘉定……州治被兵未残、庐舍完整为仅见云。”

《使蜀日记》云：

“九月一日次汉州抵新都，县皆名区，乱后中衢皆茅屋数十家，余皆茂草，虎迹遍街巷，讯杨升庵宅已为按察使署，今已荡然矣！……初二日抵成都……民居周垣不蔽，篱落而已……入东门亦无署院……西北隅则颓墉败砾，萧然惨人。”

《南溪县志》卷二食货载：

“当时故家旧族百无一存，人迹几绝。”

清初“湖广填四川”是巴蜀城镇再度兴起的转机。也是当代巴蜀城镇及建筑特色的开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期，它为什么产生了延至今日达 4000—5000 个城镇的洋洋大观。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都有卓越的见解。虽然在巴蜀城镇及传统建筑上尚还没有专门著作披露于世，以全面解释这种现象。然而，从史学的角度已有《四川清代史》等著作对四川城镇和传统建筑作了介绍，同时亦有建筑学家、文物工作者、文史家、旅游家等的零散研

究见诸传播媒介。这里面尤《四川清代史》作者王刚先生站在史学的角度，高屋建瓴地看待清代发生的现象。其观点，笔者极表赞成。他在该著作绪论篇中提出“清代四川杂交与创新”的观点，同样适用建筑学借美学、民俗学诸学科对四川城镇及传统建筑的研究，这是因为：“明末清初的四川，人口几至绝灭，经济破坏殆尽。清朝四川政权的建立，所面临的是百废待兴。要兴第一需要的是人。一个‘湖广填四川’的大移民高潮兴起，全国各地，东西南北的人民涌向四川。百废，使这些本来受四川历史文化传统影响少的人更无地域历史上的传统束缚；兴，却又使他们从四面八方带到四川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生产经验和人口素质的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并且通过广泛的杂交创造出新的经验，新的品种，新的文化，新的思想。”

作为城镇及建筑，核心同样是“湖广填四川”的人。这些人来自湖北、湖南、福建、广东、江西、陕西等省，虽然习尚各从其乡，但经过大量、广泛的通婚，在人口素质上已具备了南方人精细耐劳，北方人耿直粗犷的特点。诸多习尚已有认同，自然又产生新的经验，新的品种。表现在城镇和建筑风貌上，亦同是南北风格的大融汇。略有不同是：各省移民聚居地人口的多寡，使得融汇程度有所不同。比如涪陵是客家人聚居区之一，那里分布着不少川中，也是客家人在内地罕见的大型土楼，其形其貌已和原乡有所区别，融汇了不少中原特色在其中，然又保存了不少客家土楼成份。正是这些新品种恰又构成了巴蜀建筑特色。在遍布巴蜀的城镇中亦是同理。尤小场镇显得更加昭著。一目了然者是各省会馆建筑的区别，但它们又相安一场一镇。这就构成了巴蜀场镇杂而有序的空间景观。这样的整体空间形态和国内其他省区的小镇区别是很大的。

由于四川太大，城镇已达 6000 多个，每一个城镇的整体空间不易把握。加之建设性破坏日趋严重。为了稍为象样地把四川城镇介绍给社会，笔者以提取目前保存较好的小镇为主，目的还在引起社会注意，以尽可能地保护这笔老祖宗留下的建筑文化遗产。而县城以上的城市实则已面目全非，全被西洋建筑征服，说它原来怎样怎样好，已无实际意义。这是一个十分悲哀的话题，留待后世去评说。不过后怕在于：当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面对西方人这样的发问：“你们四川人原来都住在什么样的城镇和房子里”的问题时，不至于无地自容。这个观点是基于建筑是传统文化极重要的部分认识所成，这部分的消失对凝聚中华民族的向心力、自信力，无疑是惨重的，永无挽救之日的。

（二）巴蜀城镇空间特色

巴蜀城镇形形色色，可谓太博大，太丰富，太神秘。花样多，形貌杂，作法巧，易给人不好归类，不好捕捉之感。不少专家共识其空间特征时，认同“飘逸”为其形神之貌。

貌者，即内外整体空间和环境总和的概念。同时，它又是在数量巨大的空间认识上产生的，进而再产生城镇空间质量的优化、多样化、类型化。

亲善自然，珍惜环境

自然之爱素为巴蜀之人秉性，盆地的地理环境本来就具“大家园”意识归属，加之内地形造就了处处青山绿水的佳境。于其中建城，兴场，立镇，首要者为因地因时因事而谋划，顺其天然，不拘形式，格由自出。沿江者顺等高线沿河岸，或垂直等高线直竖河岸，或兼而有之于二者。中有西沱镇、龚滩镇等凡例上千。而诸如重庆、万县等一大批山城者，更是显示一幅立体自然与人文景观昭然天下。又如阆中昭化一类精密运算，谋筹度量山水之间，以形胜治城者，更是把城镇建设推到“风水”理论高度。个中情由理趣，仍在保护自然环境的现存状态更谋发展。还有数不清，家家都在花丛中，镇镇都在山水浓荫里的风景小镇。诸如五通桥、柳江场、偏岩场、东溪场……更是遍布巴蜀大地，直到穷乡僻壤，边境死角。而像犍为县罗城镇、广安肖溪镇等根据地形，揉以理想变幻出船形、龙形、磨子形、口袋形等异趣迭出规划形态者，亦在自然的深化行为中，注入了更具特色的川中人文风范的机智与谐理。川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产生活，滋养了一派宽容大度、悠哉游哉的幽默性情不说，又创造了城镇建筑“筑台、跌落、错层、吊脚、悬挑、架空、附岩、分层出入等一整套巧妙的处理手法。”

乱真自然，就地取材

川中丰富的木竹、秸杆、草类，随处可取的各质泥土、石材，皆为建筑用之不竭的源泉。无论城镇与农家住宅，广泛在基础用石材，使得城乡清一色石板路，石板街道。有的城镇索性选址“大石盘”作场镇基础，就地取石，既得街面石梯、平台，又得房舍墙基石和墙体，西沱镇便是此例。沿江场镇还采取河中卵石砌墙，总结出一套完整的卵石墙工艺。至于各地场镇的毛石墙、石板墙、“干打垒”、乱石墙、石片墙则更是数不胜数了。边远山区场镇和盆地内部分石、木材料缺乏者，以土夯墙，土坯墙构成场镇浑厚的土黄、土红色调。尤门窗间以木作，烘托出粗中有细，对比协调的朴素典雅气氛。更多的川中城镇普遍偏爱全木结构的材料使用，使得整个场镇全构架在木质特有的温暖与宁静的空间组合中。把自然界的一种生命体经规划设计，以空间形式诉诸另一种生命体的构想。并使二者朝夕相伴，是不同生命形式完美结合的追求。里面蕴含了远古巢居的遗恋，又泌流出祖先天人合一、返朴归真的纯香。川中草屋虽貌似简陋，凡稻草、麦草、茅草皆可遮风避雨，又冬暖夏凉。里面一样如小青瓦复盖的多式形制。甚至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过去街道旁亦不时点缀三五间别致的草屋，造成农业社会城乡媒体的兴奋点。亦让人感到回肠荡气，

分外亲切。各种建筑材料混作，或石材基础、木柱木梁、竹编夹泥墙、青瓦屋顶，或土夯坯墙、石柱木梁、秸杆风障、杂树篱笆、树皮铺顶，甚至全竹小屋、石板作瓦、泥沙平顶等等之建筑，皆可见于川中城镇和乡场房舍。不少更以火砖砌起高大的各形封火山墙，以材料的多样性展示了城镇空间丰富统一的特殊魅力，尤以强烈的整体空间形象大别于天下，独善其能地呈现出唯巴蜀之境方才能见的，各地移民和衷共济的卓越风姿，以及所依赖的材料组合之美。

多样统一，别开生面

川人乐观诙谐、勤劳坚忍、雍容大度。尤城镇空间可见一斑。故同居一城一镇一场，不求形式上的统一划一。求个意投神合，整体中有个性，个性中不甚偏颇的杂而有序。故你家在屋顶上建碉楼、小姐楼、晒楼可，建戏楼、牌坊、过街楼也可。全城镇齐心协力于城中再建钟鼓楼、城楼箭楼可，在外建塔建阁，建桥复廊也可。若植几棵大树于街中、镇旁、河边、院内，亦更是可中更可。这就把川中城镇空间的宽容度伸展到极大的张幅。亦把整体空间外轮廓线变得起伏有加、高低错落。内空间的各家之间亦层层叠叠，纵横穿插。然统得静谧和气，相安无恙。此绝然不仅是表面的空间艺术气氛和建筑的表现力，感染力所酿成。若统观国内其他省区城镇比较，则少见如此多样统一，别开生面的空间现象。因而，不能不揭开屋面洞窥屋中人的由来。因为他们是造成此般气候的根源之所在。大而言之四川是移民社会，小而言之，一城一镇之人亦是五方杂处。“习尚各从其乡”，导至各有各的作法。亦正是“湖广填四川”各省建筑风格的争奇斗艳。然又“杂处”一境，必然削弱各自太出格的外观、装饰。又融汇了对方建筑各部的长处。《四川方言与民俗》言：“明清时期，是四川方言的形成时期。”民俗往往和方言有直接关系，建筑作为民俗事象，尤城镇风格，形成亦多在明清之时，表现出与方言形成的一致性，故多样统一为其别开生面特点。

寺观馆祠，半城争辉

凡入川中城镇、乡场者，几里之外，亦见大群屋面上有四角高翘，中脊朝天，装饰灿然的歇山式屋面，或琉璃瓦或小青瓦复盖。以迥然不同于民居硬山式屋面的高大形象巍然争辉于群屋之中。少者三五点缀其间，多者一条街，占据一角，连成一片，誉有半城之势，十分壮观。此便是脍炙人口的川中“九宫十八庙”之谓。它造成城镇空间非凡的变化，把称为“第五立面”的屋顶完善到与世界任何民族建筑绝然不同而具特色的程度。梁思成先生在《清式营造则例》中说，它是“中国建筑的最重要部分，在中国建筑中，尤其是宫殿建筑中，所占的位置最为重要。”在同一本书中，梁思成夫人，一代才女林徽音女

士于绪言中更作了极精彩的描绘：“我国所有建筑，由民舍以至宫殿，均由若干单个独立的建筑物集合而成。而这单个建筑物，由最古代简陋的胎形，到最近代穷奢极巧的殿宇，均始终保留着三个基本要素：台基部分，柱梁或木造部分，及屋顶部分。在外形上，三者之中，最庄严美丽，迥然殊异于他系建筑，为中国建筑博得最大荣誉的，自然是屋顶部分。”“它的特殊轮廓为中国建筑外形上显著的特征。”“形成一个极特殊、极长寿、极体面的建筑体系。”

川中城镇凡寺庙宫观、宗祠会馆多以宫殿格局形制建造。它和民居统筹于城镇空间，其量不定乎九宫十八庙之数，少则一、二，多则数十、上百。视人口构成、财力物力诸因而定。傅崇矩《成都通览》言成都之寺庙：皆“余所亲见”，包括“府文庙（南门）”者就达156所，清真寺9所。城内各姓祠堂，偕“廖家祠（石马巷）”等达83处。黔、豫、粤、徽、桂、浙、楚、湘、闽、晋、陕、赣、川、滇会馆16处。还有衙署之类。其量之大，其形之空前，均把成都传统建筑推向极辉煌的境界，亦在空间营造上烘托出无与伦比的优美壮丽气氛。自然成都就不至“九宫十八庙”了。乡间场镇按此布置，多多少少，均构成对整个格局影响，造成屋面及外轮廓的生动变化。故川中城镇多样民居与为数众多、形体殊异的宗教、宗法建筑统筹一起。相互争辉又融融乐乐，展现了一幅通过建筑传达的东方文化洋洋大观。

文人经营，约定俗成

知识分子在民间无论社会地位被统治者贬损得怎样低下，“九儒十丐”也好，教书匠、画匠也好，热爱本乡本土自为神圣，并积极参与城镇规划、宅园营建。其行为亦有民间百姓的尊重，对知识的渴求作为基础。建筑学家庄裕光先生认为“四川的大部分小镇，犹如丹青长卷，无处不具诗情，处处皆可入画。”“文化名人都曾以其高深的文化修养，以自家宅园为依托，营造了许多富有诗意的环境。这些名人故居和园林经历代文人、画师和造园家的维护与创造，使每座园林都像充满钟毓灵秀的气氛，文风辐射四邻，使大环境受其影响而增添了难以言表的雅气。”庄先生又在《四川小镇民居精选》漫说巴蜀小镇建筑中综览：“正是这些遍布蜀中的名人园的带动……樵夫与耕者，出入画屏中。”所以川中城镇不少传导出一种与众不同的特有的气质和性格。这便是儒雅雍容，又朴素大方。这里面除大文人大画家以造园、艺术作品影响之外，本地知识分子是贯彻这种艺术思想的积极推行者，身体力行者。故有各地城镇八景之佳，十二景之爱。这实则把原本是纯人文环境的城镇和周围自然景观纳为一体观照。是极具超前的规划手法和环境意识。是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生存质量的稳定和提高极宝贵的财富。这种环境若干年来得以维护和延续，更还在于有良好的社会认同，百姓文化素质基础。也是孔孟之道几千年的熏陶，其自然观、人文观、生存观浸透国人细胞，反映在各文化层次人身上的约定俗成。民风之成、于斯正是。城镇